

周作人平议



周作人（1931年）

周作人手迹

有人问我这篇是什么体，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法国波特
来尔(Baudelaire)提倡起来的散文诗，是亦庄亦谐，不图
那是自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列，内容大略像
仿欧洲的俳歌(Billou)的格式，却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却连
一首韵文也没有，真是滑稽，也未可知。这是没有什麼用
处。八年一月廿四日

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铁荣 / 著

- 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
- 周作人出任伪职经过
- 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
- 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
- 周作人与鲁迅新诗之比较
- 周作人1949年以后的散文论
- 周作人与《文字同盟》
- 周作人与《古今》杂志

屠格涅夫評說



屠格涅夫肖像(列賓作)



屠格涅夫與俄羅斯
文學復興 / 編

屠格涅夫是俄羅斯文學復興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文學創作對俄羅斯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書收錄了屠格涅夫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詩歌等，並附有相關的評論和介紹。本書旨在幫助讀者了解屠格涅夫的文學成就，並探討俄羅斯文學復興運動的背景和意義。

周作人平议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张铁荣 / 著

周作人平议

张铁荣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98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ISBN 7-201-02437-X/I·92

定价:9.50元

序

舒芜

大约近十年来，周作人和胡适这两个研究禁区，都已逐步被打破，出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是，情形又有不同：在胡适研究中，比较能集中力量研究他一生文化上思想上学术上的成绩，该肯定的不妨充分肯定；而在周作人研究中，却不得不分去许多精力，辩解式地反复说明何以有研究的必要，不得不处处联系周作人抗战期间叛国附敌那一段历史，以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肯定成绩时最好七折八扣，指出缺点错误时怎么夸大都成。如果你论证周作人一开始就是混进新文化阵营中的右派，必然要一步一步走向反人民反民族，如果你从他早年的每一成就中都找得出通向汉奸的轨迹，你的研究不会受到什么责难。如果你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掩饰他叛国附敌的历史，也不缩小他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巨大贡献，那么你的研究就可能受到种种指责，甚至你的研究动机似乎都很可疑。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周作人确有那一段叛国附敌的历史的缘故。

但是，胡适的政治方面的历史，难道就没有不光彩的事么？且不说他同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的有距离的合作关系，单说抗战胜利之后，举国渴望和平，胡适他却那么出力支持蒋介石“戡乱”，1946年他在伪“国民大会”上，竟以伪“国大代表”总代表的身分，亲手捧着蒋记独裁内战的伪《中华民国宪法》的文本，授予蒋介石，作为蒋介石就任伪“总统”的法律和民意依据，这一“历史性镜头”当时煌煌刊载全国报刊，这比周作

人在北平检阅青年的那张照片，政治上可重要多了。但据我所见，约十年来的胡适研究中，没有人再提他这些不光彩的历史，更没有人竭力在其每一成就中找寻他通向蒋家朝廷的足迹，也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的必要性，没有人怀疑胡适研究者的动机。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看，很可能是因为：一、1954年曾有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很使人反感，现在等于对那次政治运动来一个平反。二、也许还同和平统一台湾的现实政策，有某种微妙的联系；连蒋介石本人都已被尊称为“老先生”，公开出现在重要政治文件中，那么胡适对蒋的支持合作，当然可以不再多说；而我们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巨大的民族仇恨，则使叛国附敌者得不到同样的对待。

我揣测的这两个原因，不知对不对，但我敢肯定一点：胡适研究目前这种情况，是正当的，应该的。胡适尽管对论政和政治活动很有兴趣，但综观其一生，毕竟主要是一个文化人思想家学者，所以主要应以文化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只有政治家，才应该主要以政治标准去衡量。无论谈谁，谈什么，都是“政治标准第一”，那种论法曾经盛行，现在是应该换一换了。

周作人的一生，也主要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同样应该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来衡量。他在文学上思想上的成就太大，我们不应该用一顶“汉奸文学”的帽子一笔抹杀，那不符合历史，也不利于我们继承这一份不该拒绝的遗产。至于他叛国附敌，这是政治行为，对此当然要用政治标准，无须曲为之讳，更不能像前几年有人造出新奇之说来为他翻这一案。其实，若专论胡适的政治活动，同样是应该用政治标准衡量，不应该替他掩饰。

这个道理，现在说起来，虽仍会有人反对，但赞同者是越

来越多了。现在有一个复杂的情况，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之后，叛国附敌之前，有相当一段时间，被青年人认为“消沉落伍”。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起来以后，周作人作为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作家的代表，受到左翼青年的攻击，他也与左翼青年多所争论。这样，他这“消沉落伍”的一段，似乎恰好在他“五四”时期一段与叛国附敌一段之间架起一个桥梁，一切似乎都是宿命式的“必然发展”了。

其实，周作人的所谓“消沉落伍”，情况很复杂。今天看来，有些并不是什么“消沉落伍”，他不满足于当时左翼青年的，历史倒是证明了有些是他看得对，例如他一开始就反对用多数的力量来压制思想，换言之就是反对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有些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的问题，他的兴趣爱好固不足以帮助革命，但也说不上妨害革命。有些确实是悲观消沉，但人都很难永远乐观积极，何况有时有些消沉其实是过苛的责备激而使然的。

所以，现在的周作人研究，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麻烦问题：究竟周作人曾经消沉到什么程度？哪些“消沉”是当时左翼青年的误会，一直沿袭下来？哪些与消沉不消沉并无关系？哪些是真正的消沉，但可以原谅？哪些真正的消沉，对世道人心有害到什么程度？如此等等。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方能还周作人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描述他一生的发展道路。

张铁荣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周作人研究者。1985年出版的张菊香、张铁荣编的《周作人年谱》，1986年出版的张菊香、张铁荣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早已为新时期的周作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贡献甚大。这些年来，张铁荣先生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周作人研究的论文，现在集为《周作人平议》一书，予以出版。这本论集所探讨的很广，而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敢于以很大的理论勇气去碰上述麻烦问题。

例如，周作人1927年写的《闭户读书论》一文，他自己很看重，但一向被指责为从积极转向消沉的宣言，甚至被说是“被蒋介石的屠刀吓破了胆”，引诱青年躲进书斋，脱离现实斗争。张铁荣先生却令人信服地指出：此文实与《碰伤》、《前门遇马队记》等文一样，是用反话来写的，周作人惯用反话的形式来表示他的悲愤。此文有力地控诉了当时北京在奉系军阀血腥统治下的言论不自由，文中劝青年人读的是历史书，并非脱离现实，正是要青年从黑暗的过去，来加深对黑暗现实的认识。

又如，周作人一向热爱日本文化，也一向痛斥日本侵略者侵华反华的言行，但有时摆不好二者的关系，甚至曾要求中国人对日本应“在不愉快之中发现光辉与美”，很引起爱国青年的不满。但张铁荣先生指出：周作人发此言后的两年半，便在《语丝》杂志上发表《排日平议》一文，激烈地指出：“不能因为怕日本研究之顿挫而以排日为不正当。”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由冷静客观的学者态度向民族主义的回归，可惜此文一向少受注意。

又如，周作人一贯提倡“趣味”，30年代提倡“闲适”，长期以来被指责为“给国民党帮闲”，“同鲁迅完全对立”。张铁荣先生即从鲁迅所云“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二者“势不两立”之说得到启发，认为周作人正是一贯以教书为职业，又一贯以作家知名，陷入“势不两立”的怪圈，他只好以“趣味”“闲适”来调节精神，在怪圈中挣扎。这只是文化艺术上的趣味，与他后来政治上“落水”无关。

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张铁荣先生在澄清有关周作人“消沉时期”的诸问题上，作了多大努力。他的意见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同意，但肯定都能把研究推向前进，这是最主要的。这里应该着重指出，张铁荣先生对于周作人叛国附敌一段历史，一点也没有曲为之讳。他以前写的《周作人出任伪职经过》一文，

现在好在也收入本文集了。

本集还有其他许多精辟之论，例如充分肯定周作人“五四”时期的名文《人的文学》的巨大理论价值，指出现存的大部分文学史对此文的评价很难说是公平的。又如，第一次全面研究了周作人解放后的大量小品散文，指出大部分研究者对此都分析不足，或评价不高，其实这是周作人散文小品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应该给以足够的重视。凡此也都是理论上的勇气的表现，不一一详介。

我想向读者着重推荐的这种理论上的勇气，当然是从科学的真知灼见而来，同时也是与褊狭独断苛酷之风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大家知道，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终身未复好，后来彼此思想上分歧甚大，鲁迅论人论事向来坚持战斗的原则性，但是他就很不满意当时某些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苛酷的批评。鲁迅逝世后不多几天，周建人就向周作人郑重转述鲁迅生前的意见道：“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又说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的一段文章为例），在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周建人1936年10月25日致周作人信，载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我借周建人转述的鲁迅这个意思，作为张铁荣先生这本书的题词。

1995年6月19日序于京郊碧空楼

目 录

序.....	舒芜 (1)
周作人研究的动向和展望	(1)
关于周作人的贡献与评价问题	(14)
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	(37)
周作人“语丝时期”之日本观	(55)
周作人与《文字同盟》	(80)
周作人与《古今》杂志.....	(100)
周作人遇刺未遂事件.....	(125)
周作人出任伪职经过.....	(137)
读周偶感 (二题)	(161)
周作人的佚文.....	(168)
周作人与鲁迅新诗之比较.....	(177)
周作人 1949 年以后的散文论	(191)
《鲁迅周作人比较论》读后	(231)
评钱理群著《周作人传》	(234)
读《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239)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刍议 (244)

后记..... (251)

周作人研究的动向和展望

中国的《文学评论》杂志曾于1990年第5期，发表了黄开发先生写的《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一文。黄开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把中国的周作人研究从兴起到1989年1月止，作了较为详细而又有重点的介绍，对于他的观点与看法，我基本是同意的。要想了解80年代中国的周作人研究情况，请参看这篇述评。本文主要介绍1989年以后至1992年的研究动向，再对黄先生没讲到的地方做一点补充。还想对今后的研究发展进行一下展望，也就是针对目前的研究动向做出某种预测，这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只能谈谈自己的浅见。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盼能得到各方面的教正。

一、1989年以后的研究动向

中国的周作人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其中成绩也是引人注目的。到了198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反复。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提供的目录索引和《鲁迅研究动态》（月刊）总目的统计，1989年7月至12月共发表周作人研究的文章有6篇，这表明研究文章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在这6篇文章中，我认为黄裳先生写的《关于周作人》（见《读书》1989年第9期）比较重要。他在文章一开始这样写道：

最近关于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投敌前后的史实有过颇

为热烈的讨论和研究。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自己说来也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至于在这中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的变化，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意义恐怕比研究周作人本身来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

黄裳先生在这里指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投敌前后的史实的讨论和研究，中国的研究者们“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对于周作人思想活动、心理状态的研究是重要而又有意义的；第三、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中曾经有过“光荣”，并不是开始就很坏。在当时“左”倾思潮已经到来，黄裳先生能强调指出这三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之所以强调黄裳先生的文章有意义，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论文确实出现了对上述三点论题的否定。

1990年是中国周作人研究论文最少的一年。而本年的出版界却获得了意外的丰收，这就是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倪墨炎先生的专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9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先生的专著《周作人传》。虽然这两本书写于1988~1989年，但它确实给处于沉寂的研究界带来了某种生机。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形势的关系，钱理群先生那篇充满激情的《周作人传·后记》被删去了。从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册传记发挥了作用。

本年度还有两篇论文值得一提，第一篇是发表在《广东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上郑世平先生写的《周作人后期思想管窥》。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考察周作人悲剧的“历史原因”和“文化现象”。作者指出：“周作人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封建传统型的

知识分子。它根生于文风昌耀的江浙土地，成长于世代书香的绅宦门户，血质上早已被这样定型，而心理素质从一开始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框架。这个框架即以儒家的入世哲学为根据，以老庄的游世态度为依托，以禅宗的出世思想为归宿的结构。这种本来只是组成思想的精神结构，却又往往外化为一种人生历程，而成为命运的三部曲。”这个评价怎么样我们还可以讨论，但是把周作人的悲剧说成是在“社会更年期里”“怪圈的形势是一种历史的宿命”，这种观点似乎还是少而新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上，是方卫平先生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作者认为从1912年到1923年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中，“人类学派学说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之一”。人类学派理论对20~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神话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是接受、运用和传播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并广有影响的第一位学者，许多后起的童话研究者都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这种从儿童文学角度研究周作人的论文，在中国似乎还不多见。

1990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黄开发先生写的《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这篇文章对过去十年的周作人研究进行了总结，同时也代表了研究界的深沉思索与期待。

1991年，周作人研究的论文有明显增多趋势，两册周作人传记开始发挥作用。在数篇对周作人传记的评论中，人们都认为这两册传记达到了一定的研究水平，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我认为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上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写得最精彩。他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动荡的社会中的身份之转化，来分析周作人的悲剧意义。他指出：在周作人身上，“真正的悲剧性的对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官僚知识分子的对立，这才是自由知识分子在专制时代的一个失败，不仅对周作人个人有意义”。这篇评论还引用了一个从未

发表的材料，颇值得重视。他说：“记得几年前我在太原访常风先生，常先生告诉我一件事。抗战胜利时，沈兼士任国民党在北平的文化接收大员，周曾对常风表示，他认为沈兼士可以派他到日本去负责清点从日本归还的文物工作。可是第二天他就被国民党逮捕了。可见周作人并没有把自己与一般汉奸等同起来，还自以为有功于文化教育。”

本年度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有：

陈漱渝：《两峰并峙 双水分流——胡适与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第1期）；

顾琅川：《周作人与公安三袁》（《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1期）；

丁亚平：《自己的园地：无声潜思与独立探询——论周作人的文学批评个性》（《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常强生：《论周作人“五四”以前的文艺思想》（《扬州师范学院学报》第四期）；

顾琅川：《越文化与周作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

陈颖：《“周作人现象”的思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廖超慧：《同路未必真同志——鲁迅、周作人前期人生道路之比较》（《江汉大学学报》第4期）；

祝肖因：《周作人早期日记与鲁迅研究》（《鲁迅研究资料》第24辑）；

于造成：《周作人遇刺真相》（《鲁迅研究月刊》第9期）；

文洁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周作人》（《随笔》第5期）；

邹华：《两种美学矛盾观的对立与互补——鲁迅、周作人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鲁迅研究月刊》第7、8期）；

舒芜：《应向低处广处看——周作人的文艺文化结构观》

(《中国文化》第5期)。

在这数篇文章中，我认为祝肖因的《周作人早期日记与鲁迅研究》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他认为在周作人日记里保存了相当丰富的鲁迅早期诗文，这是“周作人为鲁迅研究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称道的贡献”。由于周作人日记的“权威性”、“原始性”、“可靠性”和“相关性”，“它对鲁迅研究已经和继续可能发生的作用，恐怕是不应低估的”。作者指出：“在这些早期日记里，蕴藏着丰富的尚未广泛引起注意的有关鲁迅青年时代的珍贵记录，这种记录的价值远非日后的回忆所可比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发掘探究。”这篇文章的重要处在于它对出版周作人日记起到一种呼吁作用，这也是广大研究者所盼望的事情。

在我上面所列举的目录中，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周作人现象”的思考》一文，是首次批评舒芜先生的，该文指出舒芜先生说周作人身上“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是“夸张”。文章认为：“‘五四’以后，周作人进一步强调艺术家应极力追求内在的真，强调文学的个性主义，同时鼓吹主体体验式的文学批评，否认客观批评标准的存在，显然是人本主义文学观朝个性主义文学观合乎逻辑的发展。标志着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开始滑向危险的斜坡。”这样评价“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文学观恐怕是有问题的；至于把周作人的“身败名裂”原因，说成是包括他的“次子地位”、不像鲁迅那样承担“家庭义务”、“混迹于街市里巷”、“和‘破脚骨’结为朋友”、“闲适淡泊”等，“可以从周作人青年时代的生活以及他一生遵奉的人生哲学中寻找某些答案”。这样的提法不仅失之简单，而且分析不足。作者还把周作人与“当今的所谓文化‘精英’”一起批判，这简直就不能说是研究了。另一篇《同路未必真同志》的文章，是写周氏兄弟反目以前的不同之处的，指出：“就在他们的‘合中’，已隐含着人生追求和志趣之异。”

1991年8月，钱理群先生研究周作人的第二本书《周作人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大胆探索，肯下力气的收获，其中的理论色彩是浓重的。我认为第二编第七部分《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是全书中写得最精彩的。

1992年是周作人研究深入开展的一年。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研究界的“左”倾思潮有所纠正，比较正常的学术空气开始出现。

1992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董炳月先生的《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一文。作者指出，《周作人传》特别值得一提，“该传的最大成功，在于它把周作人这个复杂的生命个体，这个具有‘类’的典型性的文化人放在社会动荡不安、文化新旧交替的大背景上来认识，揭示其文化思想上的种种冲突，探讨其心灵的痛苦历程，描绘其命运的变幻起伏，展示其渺小与伟大，从而引起人们对社会变革、文化重建、文化人的存在方式、存在价值、历史地位等问题的思考，并反省本身。《周作人传》因此具有哲学家的品格”。

过去曾有人简单地从鲁迅爱故乡周作人不爱故乡，分析他们的思想差异，这种观点从今年开始有了改变。李晓航在《社会科学家》杂志上发表的《鲁迅周作人故乡之思的文化差异》引人注目，他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认为，鲁迅对故乡之思以及故乡生活令人绝望的生存境况都取一种冷峻的批判态度，是自觉地斩断精神上与过去的牵连；周作人不同时期对故乡之思所附注的浓重情感，实际上不仅构成了他对传统文化挥之不去的一种不自觉的依恋，同时也成为他面对现实的思想矛盾不能化解情形下的一种精神寄托。文章还分析了周作人故乡情结中的地域淡化，“宗帮为疏，异域为亲”的情感错位现象，为解释周作人独特的文化个性提供了依据。

1992年，《文艺报》一连发表了数篇有关周作人的文章，展